



“大家小书”系列部分作者近照

“大家小书”系列丛书出版——用小书与大家对话
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撰文引荐过日本的岩波文库、岩波新书等等,这类内容以普及知识为目的,找各领域的专家为一般读者写的深入浅出的小书在日本很有影响。“这类小书,我觉得在中国特别需要。”他还自告奋勇联系出版社,希望能帮助出版属于中国的“大家小书”,遗憾并没有做成,“组稿很困难,卖起来更困难”。眼看学术界出书越来越厚,动辄四五十万字,写薄了都不好意思拿出来,他又写了一篇文章《怀念小书》。近日,在“大家小书”系列丛书精装版首发式上,陈平原旧事重提,“好不容易有一百多本书拿出来给中国的读书界,虽然其中水平不均,体例不一,但是我还是认可这套书编纂的工作”。

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为“大家小书”丛书写了总序,他在序中说:这是一套“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”。所谓“大家”,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: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;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,是大家的读物。而“小书”,



一是指其篇幅小,二是指姿态低。但就其分量而言,非但不小,反而相当重。出版方解释,小书之所以不小,是因为这些书均为各个领域的经典之作,“大家小书”的各位作者也都是学界泰斗,“他们厚积薄发,热忱地将自己毕生所学、所思深入浅出地奉献给大家”。

“大家小书”自2002年初版以来,历时十五年,迄今已出版百余种经典,涵盖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哲学、语言学、社会学等多门学科。有的引导文学欣赏,如夏承焘的《唐宋词欣赏》;有的介绍入门路径,如顾颉刚的《中国史学入门》;有的传道授业解惑,如

赵朴初的《佛教常识问答》;有的是学科概述,如姜亮夫的《敦煌学概论》;有的是学科历史扫描,如刘叶秋的《历代笔记概述》;有的贯通科学与人文,如竺可桢的《天道与人文》。

“大家小书”丛书收录了诗词研究家叶嘉莹的《名篇词例选说》一书。谈及对“大家小书”的理解时,叶嘉莹说:“大小之间关系密切,你没有大的根底,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。没有大的修养,想写小的也是浮光掠影,不会有很深刻的见解,也不会讲到真正的生命的所在。你的知识、学问、修养,一切都有密切的关系。”

“大道至简,真理平凡,要能够至简地把大道理说出来,需要有相当的修养,有文化的修养、专业的修养才能够写出来。”在“大家小书”丛书发布会上,丛书编委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说,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,“很有本事的一点就是化简为繁,大家觉得只有把简单说复杂了才显得有学问,但是真正的有学问体现在至简里面。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瞿林东也认为,相比于大部头著作,经过专业人士遴选的大家小书,对我们今天过分地追求那种“大”,是一个很好的补充,一种调剂,“真正的学问,用小书也是可以表现出来的,甚至有很强的生命力,这对当前我们的文化发展、学术发展,我们的学风应当怎样正确认识,都是很重要的。”

在陈平原看来,大家写小书很不容易,除了在语言上要特别讲究外,还要有自觉跟读者对话的意识。在“大家小书”一百多本书中,陈平原认为有三本书最符

合他对丛书的定位:朱光潜的《谈美书简》、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和季镇准的《司马迁》。“大专家写小书不容易,放下架子,面对读者,语言还要特别讲究。”

现有的“大家小书”的作者多数都是已故名家是或是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,缺乏年轻的学者。对此,陈平原说,现在年纪不太大的还没有退休的大学老师们,由于受整个学术体制的制约,很难全心投入到面向大众普及的“小书”创作中,“写这些小书是不算学术成果的,人家就会说你是不是想挣稿费”。

陈平原为丛书挑的另一个刺是,“大家小书”基本上都是文史类的书籍,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好书。“我特别喜欢竺可桢的《天道与人文》,我们不会读气象学、地理学的书,但是他的书里面有这一类知识。”他也希望,未来的“大家小书”能够有一类面向公众,谈自然科学、谈人生、谈人文的书籍,“不止有文史哲,更有政经法,还有自然科学的大家,他们写的小书。”

□王昱

最近,偶得一套名为《大家小书》的丛书,觉得很有意思。据出版者在书中介绍,所谓“大家”,是指学有专长的老一辈学者。也寓意本套丛书是为大众阅读而编辑出版的。所谓“小书”,是指所选著作都是篇幅短小的作品,用32开印刷,便于携带阅读。

用32开的口袋书讲大问题,这个在我国还十分鲜见的体例让我想起了在日本逛书店的那段日子。有一个盛传已久的说法,说日本人每人每年读书40本以上,而自诩有着博大精深文化传统的中国人,平均每人每年阅读量不及日本人的1/10,连十本都不到。可是,如果你真到日本的书店去看看,会发现在这种比较中,日本人其实是要赖的——他们读的大多数书实在太小了,小到跟苹果出的iPhone6 Plus差不多大。日本人用这种小32开本的口袋书几乎能谈任何问题——广大宅男喜闻乐见的工口漫画是这么印的,很多严肃的玩意儿他们也这么印。我在这类小书的书架上曾经看到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写的《致美丽的日本》,几乎是乡下老农拉家常的口气向民众说明他的政治主张,旁边紧挨着一本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半藤一利写的《昭和与日本人失败

中国的学者们喜欢用大部头去研究小问题,一个有志于学的年轻人,即便有才气,也必须从很不起眼的问题研究起,等在圈里混到两鬓斑白爬到象牙塔顶端了,才敢写书谈点大问题。如果你年纪轻轻就试图用小部头写大问题,或者把教授们视为极端复杂的问题谈简单了,则不啻于欺师灭祖。

“大家”何不写“小书”

的本质》,用区区几万字的篇幅将发动侵略战争罪责的锅甩到了天皇的头上。

在日本,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著名学者,似乎都不认为用很平实的语言在小书中讲清一个大道理是什么难事。考虑到日语本来就比汉语啰唆许多,这个绝活让我十分叹为观止。在咱中国,别说“大家”,即便“小家”似乎也不愿意这么写书。至于具体原因,看看当代中国象牙塔里的学术风气就大体可知了。

记得上大学那会儿,我有位学长,因其读书破万卷、宿舍能开个小图书馆,我们都很崇拜他,以为他将来必成“大家”。有一天,他突然兴冲冲地跑到我寝室来串门,跟我说他开悟了,搞出来一套比布罗代尔(一个法国史学家)还牛的史论,他说等他念到研究生阶段,就要开始着手进行该理论的具体构建。我们当

时听了都很为他高兴,等着他出一部刷新中国史学沉沉暮气的巨著。可是等他真念了研究生,却不见搞那套很牛的史论,而是听从师命去做“明清锡箔纸研究”去了。所谓“锡箔纸”者,古人上坟所烧的纸钱也。于是这哥们儿花了三年时间,写了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论文,“浅论”了一番明清两代人所烧纸钱的问题。

中国的学者们喜欢用大部头去研究小问题,一个有志于学的年轻人,即便有才气,也必须从很不起眼的问题研究起,等在圈里混到两鬓斑白爬到象牙塔顶端了,才敢写书谈点大问题。如果你年纪轻轻就试图用小部头写大问题,或者把教授们视为极端复杂的问题谈简单了,则不啻于欺师灭祖。若干年前,有个小公务员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部头也不算小的明史通俗读物,

名曰《明朝那些事儿》,该书火了以后立刻遭到了一群老家伙的口诛笔伐。其实此公遭人恨的地方不仅在于坏了规矩,主要原因是据说他曾说过一句更犯忌的话:“就那点东西(指明史),几年就可以弄明白了,他们说耍搞一辈子,要么是傻子,要么是骗子。”

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句想砸一群人饭碗的发言,此公终于没混进学术圈,走马就任某地副县长去了,从此少有著作问世。留下一群学究,继续把学术搞得很不通俗,高深得要研究一辈子。

中国文人为啥这么喜欢把任何问题都搞得神秘秘,不屑于用三两句话跟凡夫俗子们说清楚?照搬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,我觉得这得从中国古代技术发展上去找原因。我们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术,为给老祖宗争这项专利,咱还经常要跟旁边的韩国邻居撕一下。其实,这种争执在欧洲人看来估计很无聊,在西方人的概念中,真正改变世界史进程的活字印刷术是15世纪由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,该技术普及之后西方书籍立刻变得很便宜,普通市民能够买得起,于是老百姓买书看成为了一项现实需求。至于咱们中国,虽然自吹在宋代就有了活字印刷,但一直到明清时期,主要书籍依然是用雕版印的,明嘉靖

时期,一本正版书的价格按购买力折算,放到今天少说也得1300元左右。这个价格让普通民众压根不可能买得起,书籍一直是士大夫们圈里自娱自乐的工具,当然没有必要写得简单通俗。反观那年头的欧洲,书价降低所导致的受众变化已经影响了写作者自身的思维方式,The Enlightenment 这个字眼翻译成“启蒙时代”是否准确暂且不说,至少“启蒙”这个字眼确实用得传神。那个年代的欧洲“大家”们,确实在用最通俗的笔调向人类宣讲着启蒙知识,而他的听众,不再仅仅是国王和贵族,更有普通民众。

信笔写了这么多,突然觉得有点写跑题了,手上的这套《大家小书》虽然规格上很让人眼前一亮,但内容依然是中国式的。书中的“大家”们所关心的依然是琴棋书画、诗词戏曲之类文人气息浓厚的小问题。在中国,想真正出一本像托马斯·潘恩的《常识》那样真正的“大家小书”,恐怕还要等很久吧。我们的学者们,对着帝王将相和他们自己宣讲了太久,想让他们换个姿势写作,那是很难的。

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: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:曲鹏
美编:牛长婧